

清代中晚期苏州顾文彬家族的社会融入与身份重塑

王 晗¹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苏州顾文彬家族在清代中晚期先后经历了“因贾致富、贾而好儒、由贾入儒”的社会身份转型过程，与此同时，顾氏家族的职业经历与生存空间的地理流动紧密相关，并由此出现顾氏家族在苏州城市社会阶层地位的垂直变动以及为维持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而付出的诸多努力。从社会融入、地理流动和身份重塑的视角，来探讨江南士绅阶层在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怎样的行为举措来谋求自身阶层的上升空间，继而固化新阶层的稳定性，已成为研究清代中晚期江南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变迁的增长点。

【关键词】：社会融入；社会身份；地理流动；顾文彬家族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22)06—0186—12

DOI: 10.19563/j.cnki.sdzs.2022.06.018

生存与发展是人们通过地理流动进入城市的根本动因，在城市中获取更优质的生存条件与生活方式，则是人们相互间关系的根基构建。职业身份的定位与变更、社会地位的整合与重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关系遂成为城市居民彼此间构建社会关联、纽带与组织的关键所在。明代中期以降，由于江南地区“腹地人口密集”，内河航运与海上交通体系相对健全，“为农户和高级市场之间的直接联系，提供了如此良好的运输和交往环境”¹，因此，以苏州为核心，所属府、州、县为架构，繁星点缀的市镇群体和市场体系逐渐形成²，而且“市镇的广泛性成长更甚于集约性成长”³。与之相应地，大量外来工商业人员的持续性涌入逐步演化为这一时期江南城镇社会的重要特征。其中，安徽籍商人顾文彬先祖移驻苏州，并以生存空间的地理流动和社会身份的重塑来迅速融入、适应当地社会，是一个尤为突出的事例。

目前，学术界对于顾文彬家族已有较多相关研究。⁴以往学者多从鉴藏史、文学史、社会生活史等视角来考察顾氏家族及其书画收藏品鉴、文集、曲会等家族性的文化活动，并希冀通过对地域文化重建力量和群体层面的分析，来揭示相应时代背景下的苏州及其周边地区文化群体状态。这一研究理路在过去近三十年的学术探索中，虽因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研究内容(过云楼和怡园)的特殊品质、研究方法的技术处理的不同而略有区别，但研究结论多有殊途同归之感。而顾氏家族为何会要进行社会身份的重塑？为了做到社会身份的重新定位付出了怎样的努力？甚至通过“以藏治学、以藏会友”等家族性文化活动来重建苏州文化力量和群体的意图又是什么？解决上述问题尚需突破固有的研究范式，进行相关史料的重新梳理、判读和研究。本文试图从身份重塑、地理流动和社会融入的视角，来探讨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江南士绅阶层社会身份的演变过程和谋求自身阶层上升空间的过程中，他们为提高新阶层的稳定性所从事的行为举措，以及这些举措对于清代中晚期苏州城市近代化进程产生的影响。

一、徽商入苏：顾氏先祖早期身份判读

明清时期，由于江南地区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水稻、茶叶等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大幅度提升，手工业和

¹ 作者简介：王晗，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近代社会史研究。

基金项目：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交叉研究团队“京杭大运河环境变迁与重建”（项目编号：NH33714022）的阶段性成果。

商业在经济功能型城市中获得长足发展。与之相应地，这些城市的经济地位与区位优势得以进一步凸显，其中，苏州的经济功能优势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一时期，苏州无论是在行政等级中还是在‘自然’的手工业和贸易体系的等级中都是最重要的城市。”⁵苏州区位优势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和外来资本逐渐加持；外来移民的定居化和外来资本的汇聚，则促使苏州在承接传统经济优势的同时，自发、缓慢地发生社会转型。⁶

作为迁居苏州的安徽籍商贾顾文彬家族，据采访称，其“祖上是经商的……是元末明初从安徽迁到苏州的……一直经商、贸易，从太仓出去做棉布生意、丝绸生意”⁷，由此推断顾氏先祖有可能为具有一定财富资本的商贾。但至乾隆年间，顾文彬曾祖粹安公顾广居时，顾氏家族大多在所参与的安徽籍商贾的商业活动中，“出佐会计以修脯分供堂上甘旨”。此外，顾氏先祖“世居苏郡桃花坞”⁸，该地自元明以降多为士子隐居之地、民众踏青访古之所。至清代初年，由于“海寇作乱，苏郡有驻防兵来守，将军祖大寿圈封民居以为驻防之所，号大营兵，自娄门至桃花坞宝城桥而止，独不及后板厂一隅”⁹。由此直至康熙初年，桃花坞一带仍为兵营屯集所在。⁹在乾隆《姑苏图》中，桃花坞东侧尚有“西大营门、营房巷、西教场桥”等地标标识，具体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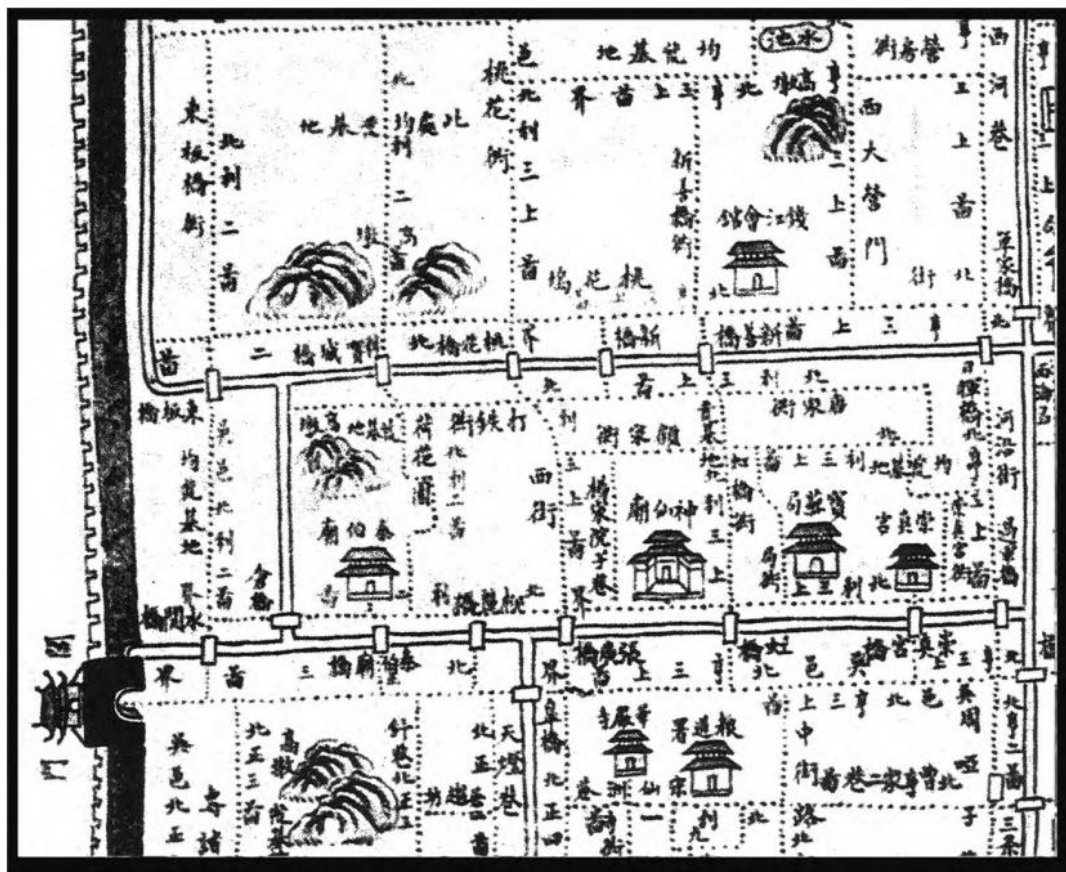


图1 乾隆年间的苏州桃花坞及其周边地区

资料来源:乾隆《姑苏图》，乾隆十年(1745)，见张英霖编《苏州古城地图》，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

从图1所标识的内容来看，受明清之际战乱和清初“封民居以驻防”的影响，直至乾隆中期，桃花坞及其周边多为苏州城区内相对荒僻之地，其中，基地、高墩、水池等无主荒地多有标识。此外，尽管乾隆《姑苏图》中桃花坞附近也有钱江会馆、北街、新善桥巷、桃花巷、宝城桥、桃花桥、新桥和新善桥等地标，但除却钱江会馆为杭州丝绸商贾新设货物屯集之地外¹⁰，其他地面标识皆为古城旧有街巷、桥梁，仅作当地民众生活起居之用。因此，这一带虽然是靠近阊门的富庶之地，但与中市街沿

途街市的繁华程度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顾氏先祖之所以选择桃花坞作为世居之地，一来是顾氏先祖没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商贸活动中，仅靠“会计”职业身份以获取酬资来维持生计，在“遇有不给”之时，尚需“先祖妣以针黹之资益之，深得堂上欢”¹¹；二来是桃花坞和阊门之间的有效行为距离在0.6~1.5公里之间，步行可在9~20分钟之内到达目的地，这样的距离有助于顾广居父子及时获取商业信息，通过常规性的地理流动来开展必要的商业行为；第三则是顾氏先祖的社会身份当长期属于“普通的自食其力的城市平民阶层”¹²，尚无力另置房产，以至顾氏家族在桃花坞的生活模式为“先祖昆季皆同居”，生活空间“共老屋九椽而已”¹³。不过，顾氏“三代同堂，一门雍睦，不觉居室之湫隘也”¹¹。

顾氏家族尚可维系的生活境况所产生的社会关联网络相对单一，呈现为以家族成员为核心，因同乡生意的职业关系、邻里关系而结交的城市中下阶层关系。这样的生活境况和社会关联网络，实际仍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之上的。通常来看，血缘与地缘往往被认为是构成乡村社会的根基或核心要素，二者在城市社会的初时构建过程中也发挥一些关键性作用，但绝非成熟型的近代化城市社会之根基。故而顾氏家族在此阶段尚未融入苏州城市原居民的社会中，而是依附于徽籍商贾资本，仍属于从苏州城市的寄居民向原居民的过渡时期。

二、转型与抉择：顾氏家族的职业变更

明清时期，徽籍商贾融入苏州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商业资本的多寡、经营理念的优劣、社会身份的高低以及上述三种情况互为叠加而出现迥然有异的生存、发展轨迹。如大阜潘氏，原为徽州商贾世家，清初迁入苏州，经过百余年的努力，通过婚姻、交易、思想与情感交流等，建立起社会关联，逐步融入苏州地方社会，至乾嘉以后逐渐成为苏州颇有名望的科第世家、官宦世家、积善世家和苏州酱园业的行业领袖¹⁴。又如阊门外桐溪浜朱氏，和大阜潘氏家世略近，同为徽州商贾世家，自清初由朱陵始“徙居苏州之阊门”，至第三代朱研（字子存）时，弃商从儒，“君性颖悟，山水篆隶不甚学而能，诗亦如之”。朱研在文学方面的造诣颇深，并影响到朱氏子孙，如“君之从子适庭以诗词称吴下，从子凌霄、芝田及适庭之子孟容、仲林，皆能操觚染翰，与当世词人名士往还，至君之子肃征，尤风仪朗俊，世目为神仙中人”¹⁵。由此，自朱研至朱汉倬、朱士廉等数代在乾隆年间“以经义、诗、古文、词相契好者”汇集诗友、画师、琴客、方外等二十余人在当时的吴下文坛颇负盛名。然而由于自朱研以下数代仅为县学生或监生，多不入仕途，原有的财富为之耗费，以致乾隆二十八年朱研去世时，朱氏族人竟因“贫不克葬，丐诸亲友，始得窆于灵岩山”¹⁵。

顾文彬家族在顾广居、顾鉴父子时期的财富积累不能和徽籍商贾潘氏、朱氏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依顾氏家族当时的生活境况和社会关联网络，在乾隆、嘉庆两朝国力处于鼎盛之时，其所积累的财富仅可维持家族日常之开销，其社会身份可能会缓慢地从寄居民向原居民过渡。一旦国运不济，顾氏所赖以徽籍商贾资本运行不畅，抑或家族中亲属突发状况，便会导致家族生存难以为继。乾隆五十四年（1789）前后，顾文彬大伯祖星洲公（名讳不详）、曾祖顾广居先后亡故，顾文彬祖父顾鉴开始执掌家业。在此之时，正值乾隆盛世，中产之家的财富观和择业观逐渐趋于多元化。¹⁶在此背景下，顾鉴借助父兄数十年积累的社会关系和财货，放弃家族常年执业的“会计”行当，转而在商贾聚居的阊门外南濠街开设油行，以图改变现状，谋求家族生活境况的好转。

为了确保油行生意更为有序地开展，顾鉴先后徙顾氏家族于南濠街盛家巷、由斯弄。由此，顾氏家族的生活空间由苏州城内的偏僻之所转移到了“自胥及阊，迤迤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此侨客居多”的南濠街一线。¹⁷该地区地处胥江和南濠的交汇处，是沟通苏州和外界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时人对此有着清晰的认知，“运河即古之邗沟，自嘉兴石塘由平望而北绕府城，为胥江，为南濠，至阊门”¹⁸。水运的繁忙，使得南濠一带自明中叶时即为繁华之地，时人曾言：“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二岸，居民栉比，而南岸尤盛。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过者烂然夺目，枫桥尤为商舶渊薮。上江江北菽粟、棉花大贸易咸聚焉。南北往来，停桡解维，俱在于此。”¹⁹至晚明之时，顾炎武曾对苏州，尤其是对南濠一线有着更为形象的评论，“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侏辏集”²⁰。这一盛况虽经明清鼎革之际战乱的影响有所衰退，但至康熙乾之时又得以恢复如初，至乾隆年间，“阊胥地多闾閻，四方百货之所集，仕宦冠盖之所经，其人之所见者广，所习者奢，拘鄙谨曲之风少，而侈靡宕佚之俗多矣”²¹。而“四方百货之所集”的南北货行市多在南濠，该地“川广海外之货萃焉，参苓、药物亦聚于是”²²。顾鉴兴业、置家于此，为顾氏家族财富积累、迅速融入苏州地方社会提供了必要条件，具体如图2所示。

应，告贷者踵接于门，或值匮乏，则典质以应之。由是家计大落，即布号亦不能支矣。十六年丙申迁居桐溪浜，十七年丁酉复迁居于申衙前”¹³。至此，顾氏家族由阊门外商贾汇聚之地又迁入城中居住。

顾氏家族在道光年间的生活空间先后为由斯弄、闻德桥浜、桐溪浜和申衙前。其中，闻德桥浜在闻德桥下，该桥系苏州旧有桥梁，正德《姑苏志》载，闻德桥属“城外桥二百七十二”之一，与渡僧桥、普安桥、通济桥、洞泾桥、白莲桥俱为上塘街诸桥。³²同治年间，由苏省舆图局绘制的《苏松常镇太五里方輿图》和《苏松常镇太二里半方輿图》皆有该桥的准确位置标识。至抗日战争时，闻德桥及附近朱家庄毛家桥下塘青孝桥，均被毁填埋。其具体位置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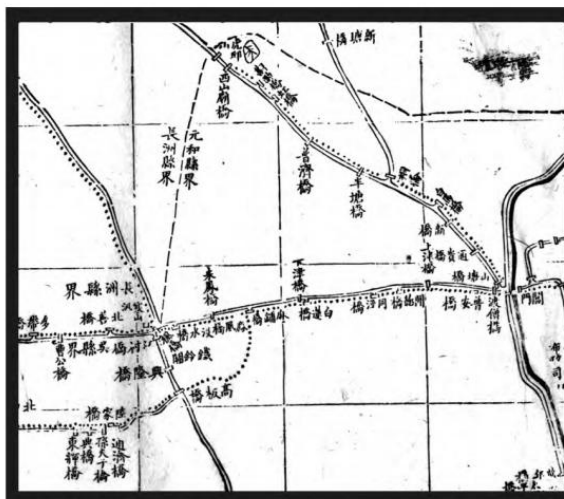


图3 《二里半图》之闻德桥、洞泾桥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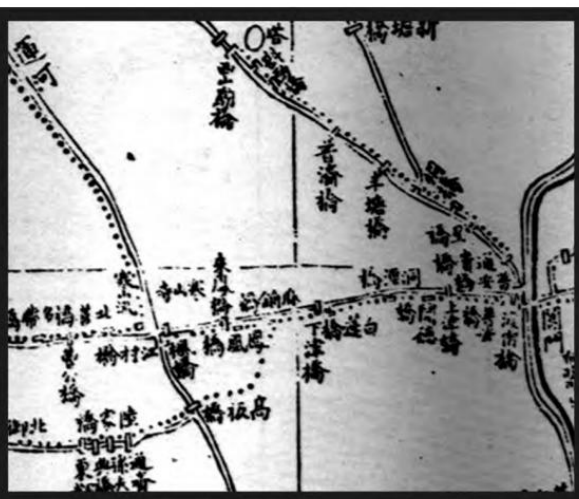


图4 《五里图》之闻德桥、洞泾桥位置图

资料来源:苏省舆图局:《苏松常镇太五里方輿图》,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同治刻本;苏省舆图局:《苏松常镇太二里半方輿图》,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同治刻本。

据同治《苏州府志》载,“府城外长洲县治桥”中,“闻德桥,在石牌巷西,国朝乾隆二十三年重建”。³³自该桥至杨家桥(北垞属无锡),“俱阊门外官塘至无锡县交界”,也是沟通苏州与无锡方向市镇的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³⁴此外,在阊门外闻德桥内的朱家庄附近,由于地面较阔,每至新年,“百戏竞陈,观者麇集,货郎蚁聚,星铺杂张,酒炉茶幔,装点一新,其热闹与元都相埒”³⁵,“且四时无寥落之日”³⁶。因此,顾大澜以闻德桥浜为重新置业的复起之地,也是看中其地理位置优势。

桐溪浜,苏州阊门外旧时地名。查明清苏州方志,阊门外无桐溪浜的地名名称,相近地名有桐桥浜和桐泾浜。其中,关于桐桥浜,道光《苏州府志》载有张光绪妻吴氏的殉夫事,其中,张光绪家住山塘桐桥浜³⁷;又,同治《苏州府志》载,“桐桥,即古胜安桥,原名洞桥,在白公塘”³⁸。查相关历史地图,民国《苏州城厢明细全图》(1921年,比例尺不详),桐桥东侧为桐桥湾³⁹;在《最新苏州地图》(1938年,1:10 000)中,桐桥西侧为桐桥西圩,该桥东侧为桐桥东圩。⁴⁰因此,桐桥浜当在桐桥东侧或西侧,且在东侧的可能性最大。关于桐泾浜,民国《吴县志》中记“诚善堂,在阊门外桐泾浜”⁴¹。在同治年间苏省舆图局绘制的《苏松常镇太五里方輿图》和《苏松常镇太二里半方輿图》中,则有一处桥梁的两个名称“同泾桥和桐泾桥”⁴²。在《苏州城厢明细全图》(1921年,比例尺不详)与《最新苏州地图》(1938年,1:10 000)中,上塘街的西园寺南侧皆标识为“洞泾桥”,该桥现名为桐泾桥,吴语方音中,洞同桐声韵相同⁴³,制图者或因避讳改“同”为“桐”,或因避俗趋雅之好,改“洞”为“桐”。桐桥浜当在桐泾桥东侧,具体如图5-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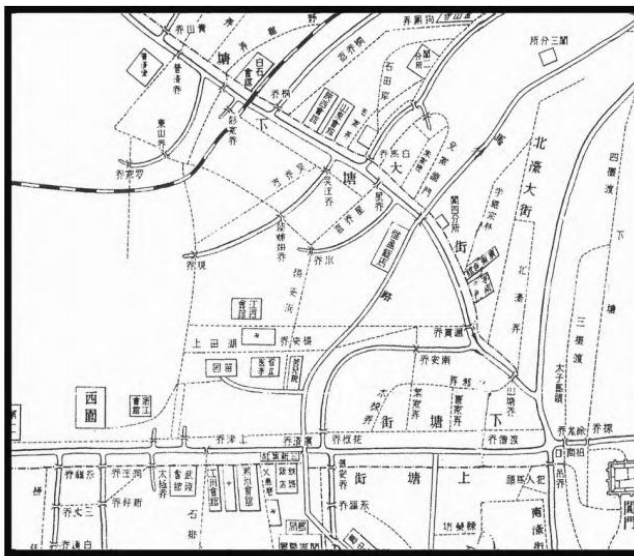


图5 《苏州城厢明细全图》(1921年)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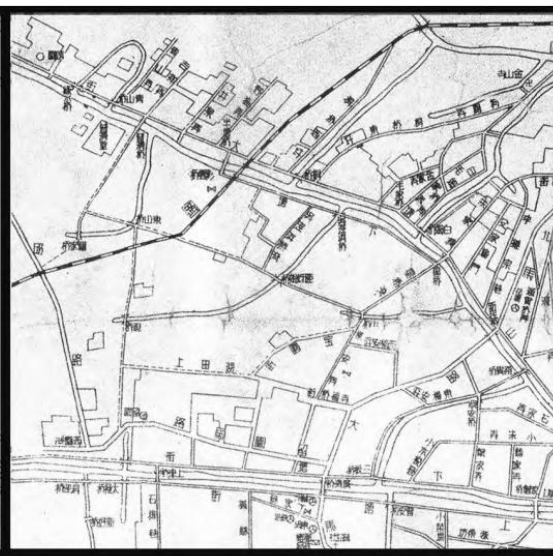


图6 《最新苏州地图》(1938年)局部

资料来源:《苏州城厢明细全图》(1921年,比例尺不详),张英霖编《苏州古城地图》,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最新苏州地图》(1938年,1:10 000),地图资料编纂会,《近代中国都市地图集成》,日本柏书房1985年版。

桐溪浜的具体地点通过历史地图比对和方志材料查询尚不得要领,桐桥浜和桐泾浜最为接近,但尚需商榷。在嘉庆《吴门补乘》中偶得“朱荇恭《雅材堂初稿》,字肃征,休宁人,寓居阊门桐溪浜,弱冠能诗”⁴⁴。由于朱荇恭乃乾隆时名冠吴下的诗文家,应该可以和苏州本地风雅之士多有诗文会友的雅事,因此从朱氏日常交从甚密的友人吴企晋、沙斗初、张昆南来看,他们皆居西郭,和朱荇恭所居桐溪浜相去数百步。⁴⁵如此一来,只要能够查到吴企晋、沙斗初、张昆南三人的住址所在,就可以得出桐溪浜的具体位置。查王昶编纂的《湖海诗传》可得,“沙维杓,字斗初,长洲人”,“斗初与张昆南皆居下津桥,自号‘两布衣’”。⁴⁶下津桥,又名通津桥,位于阊门外枫桥路,跨上塘河47,目前尚存遗迹。从图3—图5标识内容来看,下津桥在白莲桥北,靠近上塘街。从下津桥向东700余米,即为闻德桥、桐泾桥(洞泾桥),而桐泾桥下则为桐泾浜,亦可判读为桐溪浜。该地位于桐泾桥(洞泾桥)和闻德桥之间,当为顾大澜经营布号生意亏折歇闭后临时赁居之地。⁴⁸

申衙前,原属苏州府北贞五图⁴⁹,因明代万历年间首辅申时行宅第在此而得名。该街巷与郡庙前、朱明寺前在民国十七年(1928)全面拓宽,统称景德路,取名于景德寺。其中,中街路至黄鹂坊桥段为申衙前⁵⁰。申宅,“在黄鹂坊桥东,今犹名申衙前,中有宝纶堂。后裔孙继揆筑遽园,中有来青阁,魏禧为之记。其地先为景德寺,后改学道书院,再改为兵备道署,又废而为文定公宅。清乾隆间,刑部郎蒋楫(字济川,号方槎)居之,掘地得泉,号曰飞雪,蒋恭棐记之。后归太仓毕尚书沅,继为孙建威伯士毅宅。道光末,归汪氏,更名环秀山庄(即耕荫义庄)”⁵¹。文中所提及的“孙建威伯士毅”为乾隆年间文溯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孙士毅(1720—1796)⁵²。至道光年间,孙氏子孙将故宅先后以典金的形式典出,其中,“大厅、厢房、翻轩、东西书房及楼”以典价五百千文的价格典给顾氏家族居住⁵³。

通过对盛家巷、由斯弄、闻德桥、桐溪浜和申衙前等五个地图标识的考释,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顾氏家族为改变家族生存状态所做出的努力。顾鉴、顾大澜父子在主持家业之时,为降低异乡生存的风险,积极利用社会身份和生活空间的改变来应对苏州城市的社会融入。他们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桃花坞搬移至水陆环境便利、“四方百货之所集”的南濠盛家巷、由斯弄一带。在这里,他们完成了社会身份的第一次转型,即从传统城市基层平民向略有资本的商贾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带来顾氏家族生活境况的提高,而且推动了顾鉴、顾大澜父子在城市社会中向更高等级的社会地位流动。这实际上可以视为徽籍商贾整体在苏州城市的社会融入过程中,在不影响现存社会结构层次的前提下,通过社会身份的重塑和社会地位的抬升,客观上对清代中期江南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施加作用。

然而，顾鉴的骤然离世导致顾氏家族出现较为严重的危机，原有的发展轨迹发生“灾变”，“连续性”被打破⁵⁴，并有可能影响到顾氏家族的社会融入进程。具体表现有三：第一，顾鉴自患膈噎症直至亡故不及半年，顾大澜“衰毁尽礼”，短期内无法摆脱丧父之痛，这对于朝夕万变的商贸市场活动而言，颇为不利；第二，油行生意通常为顾鉴、顾大澜父子共同决策，顾鉴的去世，使得家族生意的管理层运转不畅，加之顾大澜“因会计事烦，无人佐理”，故而“辍业改置田产”；第三，因柴房失火导致顾氏家族产业损失惨重，“家之中落始于此矣”。危机之下，顾大澜曾迁居闻德桥、桐溪浜，并耗费十余年精力和财货投入到布号生意，但终以亏损歇闭、典居城中申衙前而暂告一段落。上述情形所体现出的家族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对顾氏家族在城市中社会地位的流动造成较大影响。

三、由贾入儒：顾文彬社会身份的考察

顾鉴、顾大澜父子在积极融入苏州城市社会的过程中，曾经试图通过三种社会身份的重塑来予以实现。第一种社会身份是经营油行、布号的商贾身份，第二种社会身份是改置田产、收取租银的地主身份，第三种则是从事儒学、备战科举的士子身份。其中，商贾身份虽经顾鉴、顾大澜父子的努力，一度获得成功并改善家族生活境况，但最终归于没落。而顾大澜投资田产改做地主的尝试，由于“岁不比登，万金之田息微税重，势不能支”，以至于出卖田产，“减价售去”⁵⁵。三种社会身份的尝试之中，尚可实现的，仅有从事儒学、备战科举的道路。不过，好在顾氏家族自顾大澜始，便对儒学经典颇有相通领会之才⁵⁶，加之徽籍商贾素有“贾而好儒”的传统⁵⁷，“他们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商”⁵⁸，从儒家经典中汲取各种智慧和养分。当然一旦经商致富获得生活境况的改善后，徽籍商贾家族会资助和发展儒学教育，即所谓“有功名教”是也。⁵⁹

在这样的家族期许之下，顾文彬在九岁时即开蒙受教。道光十一年(1231)，顾文彬中举；道光二十一年(1841)，顾文彬中进士。⁶⁰此后，顾文彬历任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郎中、湖北汉阳府知府、武昌盐法道员、浙江宁绍台道员，后封荣禄大夫。其实，在顾文彬任刑部主事期间(咸丰初年)，顾大澜已将家族从申衙前迁至铁瓶巷，转租王姓屋宇。⁶¹至同治三年(1864)，顾文彬在太平天国战争后，从上海迁回苏州铁瓶巷旧居。在上述官宦生涯中，顾氏也曾有过在同治九年(1870)前后的起复候缺期间，时常来往于北京德宝斋、博古斋、松竹斋、隶古斋等，掌握古玩书画行市的相关信息，兼做“贩书画客”等商业交往活动⁶²。不过，在顾文彬看来，这不仅能够减轻日常消费的压力，还可以在焦灼的候缺期盼中聊作雅趣以自娱⁶³。除此而外，顾氏多在铁瓶巷家中从事“家务宗事”，“清厘故业，抚助族姻，不复作出山计”。⁶⁴从《顾文彬日记》来看，顾氏多与地方官员保持良好正常的交往，不即不离，既不疏远，又不过于近密，基本上循规蹈矩，在官府の允准下，展开社会活动，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兼以从事诗文唱和、金石赏鉴收藏雅事。⁶⁵

在家族事务中，光绪初年，尚在浙江宁绍台道任上的顾文彬返回故里，先购得苏州城阊门外刘蓉峰“寒碧庄”外园，后转给盛康建园。顾文彬另“建春荫义庄，辟其东为园，以颐性养寿，是曰怡园”⁶⁶，置办宗族义田，下设庄田，并建顾氏祠堂“湛露堂”数十楹。顾文彬对于家族事务上的投入，为顾氏家族的维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其三子顾承所主持的年度祭祀仪式的“合法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顾文彬家族很好地融入了苏州城市社会。而过云楼和怡园的兴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达到确保顾氏家族延续、发展的目的。

在社会活动中，顾文彬着力于兴建过云楼、怡园以结交地方士绅名流和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以结交地方官员两个方面。在“兴建过云楼、怡园以结交地方士绅名流”方面，由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人口巨量损耗，乡村经济蒙受损失，地方驻防逐步恢复和重建，基层社会管理格局深度变革⁶⁷。李鸿章在奏疏中曾言“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各厅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间于颓垣断井之旁，遇有居民，无不鹄面鸠形，奄奄待毙”⁶⁸。冯桂芬估计战后苏南地区“孑遗余黎”，多者不及旧额的十分之三四，少者不及旧额十分之一⁶⁹。其中，苏州府在道光十年(1830)的丁数为3 412 694丁，同治四年(1865)仅存1 288 145丁⁷⁰，三十五年间丁额减少62.3%。作为太平天国战争前传统的商业区阊门外，在战争期间所受毁坏更为严重，这从客观上促使观前街由经济、文化的边缘走向中心，从而使苏州经济文化和社会中心的地位重合，观前街遂成为苏州的中心街区。同时，地方士绅在战后力图恢复昔日景象，以至于各私家园林景观开始重新建设。如时任江苏按察使李鸿章着手修缮的“网师园”、原湖北布政使盛康扩建的“寒碧庄”、时任江苏巡抚张树声整修的“沧浪亭”、沈秉成复建的“耦园”，另外还有俞樾“曲园”、洪鹭汀“鹤园”、吴云“听枫园”等。诸多私家园林中，过云楼和怡园地近观

前街，遂为顾文彬与俞樾、吴云和李鸿裔等地方名流的聚会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⁷¹此外，顾文彬“在退隐后游观怡园的聚会中罗织和加强了与地方精英阶层的网络建设，顾氏的私人文化活动‘以藏会友’，不断地促成与吴中士绅阶层的普遍联系，而苏州名流们的频繁造访使得怡园在诗文赞颂之中‘营建’为地方士绅群体雅聚集会的中心之一”⁷²。可见，顾文彬的诗文交往，不仅有助于顾氏家族整体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提升，更在无形中构建了相对稳固的地方士绅群体。

在“以藏治学、以藏会友”之外，顾文彬在致仕之后，多配合地方官员处理各类地方公共事务，并在参与过程中，与各级官员均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如处置丁戊奇荒捐赈事务、苏州当地赈济救难时为政府当局出谋划策，甚至亲力亲为，揣度前后情节，主持捐赈事宜。^⑤更有顾氏长期主持育婴堂事宜，尤其是在顾文彬致仕居家时，苏州育婴堂已由程藻安董理，顾文彬对于董事的推举、经费的筹措、捐款的提供，以至堂董与摊捐者的纠纷等仍具话事权。^⑥可以说，在处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顾文彬并未因为年龄的增长而退隐家中不问世事，反而以其干练的处事能力，将其苏州地方士林领袖和地方缙绅的社会身份进一步稳固。因此，上述这些家族活动、社会活动的表象之下，实际上更能体现出顾文彬围绕顾氏家族在苏州城市的社会融入、社会身份重塑，以求社会地位的长期维持和延续。

四、结论：理性抉择与社会流动

顾文彬家族在清代中晚期为融入苏州地方社会，先后经历了“因贾致富、贾而好儒、由贾入儒”的社会身份转型之路，这条道路在当时不失为一条更加符合顾氏家族的地缘性惯性思维的发展道路。虽然同样地缘的其他徽籍商贾在相似的进程中，或有大起大落的跌宕起伏，或有看似平稳却有暗潮涌动的不归之路，抑或有一帆风顺的康庄之行。但地缘关系之下，谋求生存与发展成为顾氏家族提升血缘凝聚力，在社会身份的重塑中进行理性抉择。与此同时，顾氏家族的职业经历与生存空间的地理流动紧密相关，顾文彬祖父顾鉴主持家业时，从世居桃花坞前往阊门外南濠盛家巷、由斯弄，这不仅仅是一种因职业变更而出现地理流动，更应该视为徽籍商贾在转型期中必要的生存风险承担。这种生存风险承担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顾氏家族在苏州城市社会阶层地位的垂直变动。尽管由于柴房失火而致产业受损，但顾大澜举家再次从由斯弄迁往闻德桥、桐溪浜一带，通过与人合作经营布号来维持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以及相应的生活境况。

在此过程中，徽籍商贾“贾而好儒”的传统理念在顾大澜、顾文彬身上得以继承和发展，顾大澜虽因协助顾鉴经营油行生意而半途放弃儒学深造，然而“好儒”的思想促成顾大澜寄希望于顾文彬，期冀顾文彬可以通过“由贾入儒”来实现家族社会地位的稳定和进一步提高。顾文彬先后中科举，入京为官，充任各级地方官吏，并最终在同光之际，通过“以藏治学”来教养子孙治学之道、通过“以藏会友”来交往苏州地方社会精英、通过“以藏固本”来参与地方事务，俨然成为苏州地方士林领袖。由此，顾氏家族作为地方缙绅的社会身份得到进一步固化和延续，顾文彬之后，顾承、顾麟士、顾公柔等皆成为苏州地方社会事务的主持人和重要参与者。

综上所述，通过对顾文彬家族从身份重塑、地理流动和社会融入的视角展开相应研究，来探讨江南士绅阶层在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怎样的行为举措来谋求自身阶层的上升空间，继而增强新阶层的稳定性，可以成为研究清代中晚期江南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变迁的增长点。

注释

1 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me):《人间天堂:苏州的崛起,1127—1550》,引自林达·约翰逊主编、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45页。

2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3 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年9月,第451页。

4 郑逸梅：《艺苑琐闻》，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陶大珉：《过云楼顾氏家族书画鉴藏活动研究》，中央美术学院 2004 年硕士论文；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齐鲁书社 2008 年；陶大珉：《过眼云烟：一座楼的鉴藏与艺文交游》，《东方艺术》2011 年第 9 期，第 118-123 页；沈慧瑛：《从〈过云楼日记〉看晚清士绅生活图景》，《档案与建设》2015 年第 8 期，第 59-62 页；张燕：《顾文彬及其〈眉绿楼词〉研究》，安徽大学 2016 年硕士论文；沈慧瑛：《解读〈过云楼家书〉》，《档案与建设》2017 年第 4 期第 64-67 页；沈慧瑛：《过云楼主人顾文彬家世考略》，《档案与建设》2018 年第 1 期，第 59-62 页；李睿：《顾文彬〈春水词〉探论》，《词学》2018 年第 1 期，第 113-133 页；沈慧瑛：《过云楼主人顾文彬与秦绶业的书画交易》，《档案与建设》2018 年第 6 期，第 65-69 页；施林霞：《顾文彬的日常生活研究——以〈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为中心》，苏州大学 2020 年硕士论文；曹化芝：《旅游胜地与公共场域——以近代苏州怡园为考察中心》，《美与时代》2020 年第 7 期，第 85-86 页；范金民：《晚清江南士大夫的致仕生涯——以顾文彬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第 1-24 页。

5Gilbert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6.

6 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徽州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史林》2004 年第 2 期，第 1-13 页。

7 顾笃璜口述、陶大珉记录：《过云楼顾氏后人口述辑录》，引自陶大珉：《过云楼顾氏家族书画鉴藏活动研究》，中央美术学院 2004 年硕士论文，第 80 页。

8 《皇清诰封通奉大夫先祖考镜溪公行略》，《顾文彬家乘》，苏州市档案馆藏，全宗号 030，目录号 001，案卷号 027。

9 《栖霞阁野乘》卷下之《国初之满债》，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2 页。

10 钱江会馆始创于乾隆二十三年，为杭州丝绸商贾于该年购于“阊门东北桃花坞京兆宋氏之旧庐”，确保杭州丝绸制品“得以捆载而来，僦赁无所费，不畏寇盗，亦不患燥湿”。引自《吴阊钱江会馆碑记》，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正月望日），苏州碑刻博物馆藏。由此推断张英霖断《姑苏城图》年代为乾隆十年不确，具体年代考证另文撰述。

11 《皇清诰封夫人先祖妣许太夫人行略》，《顾文彬家乘》，苏州市档案馆藏，全宗号 030，目录号 001，案卷号 027。

12 沈慧瑛：《过云楼主人顾文彬家世考略》，《档案与建设》2018 年第 1 期，第 59-62 页。

13 《皇清诰封通奉大夫先祖考镜溪公行略》，《顾文彬家乘》，苏州市档案馆藏，全宗号 030，目录号 001，案卷号 027。

14 见同治八年修《大阜潘氏支谱》；光绪三十四年修《大阜潘氏支谱》；民国十六年修《大阜潘氏支谱》；潘世恩编：《潘氏科名草·自叙》，稿本；潘世恩撰、潘曾莹录：《潘文恭公遗训》；潘奕隽嘉庆九年《展墓日记》；潘钟瑞：《欽行日记》上，见《香禅精舍集》六，光绪苏城谢文翰斋刻本等。

15 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十之《朱子存墓表》，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11 页。

16 小田：《盛世日常：〈浮生六记〉所见江南社会》，《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第 182-190 页。

17 曹自守：《吴县城图说》，见《崇祯吴县志》之《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崇祯刻本，第 11 页，总 107 页。

18 《乾隆苏州府志》卷五《水》，乾隆十三年刻本，第 17 页，总 334 页。

19 郑若曾：《枫桥险要记》，见《康熙吴县志》卷二十六《兵防·险要》，康熙十六年刻本，第2页，总1418页。

20 顾炎武：《肇域志》第五册《江南八·苏州府》，《续修四库全书》第5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52页。此外，关于明清苏州城的发展，可参考王家范：《明清苏州城市经济功能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明清江南社会史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5-69页。

21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乾隆二十六年刻本，第2-3页，总358-359页。

22 《乾隆吴县志》卷二十四《风俗》，乾隆十年刻本，第25页，总1082页。

23 盛家巷，胥门外旧街巷，东起万年桥大街，西至阊胥路。原属清末官僚盛宣怀之房产。素来商业兴旺，1940年代尚有店铺34家。现为民居（江洪、朱子南等编：《苏州词典》，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明《崇祯吴县志》卷十五《坊巷·城外》记该巷“在康履桥南”（第26页，总1212页）。入清后，《康熙吴县志》卷十三《坊巷·城外巷十八》亦有相关记载，并注明“非著名者不书”。此后《乾隆苏州府志》《乾隆吴县志》《道光苏州府志》《同治苏州府志》关于该街巷的记录与上同。至《民国吴县志》时，该志卷二十四下《坊巷下》先后记有“卢家巷、王家巷、檀家巷、盛家巷、新巷，《同治志》以上五巷并在南濠康履桥南”（第13页，总1336页）、“盛家街，由斯街北”（第15页，总1338页）、“混堂街，盛家弄北”（第16页，总1339页）。又，《同治苏州府志》卷八《水》载，“胥江，深阔，不必开浚，支河二。夏驾桥河东接胥江入口，西行至香山庙，长二百三十丈，阔一丈八尺。康履桥河俗名新开河，东接南濠入口，西行至归泾桥，长八百二十丈有奇，阔二丈五尺有奇”（第97页，总960页）。在光绪三十四年的《苏州巡警分区全图》中，自南濠入口至归泾桥沿途有桥梁九座，自西南至东北向，分别为归泾桥、通渭桥、虎啸桥、□□桥、□□桥、□□桥、小石晖桥、新开河桥和吊桥。康履桥当为虎啸桥与小石晖桥之间的三桥之一，盛家巷在该桥以南。另，巷、弄、街本意皆为“里中的道路，胡同”（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1、283、1200页）。故而，盛家巷即为光绪三十四年的《苏州巡警分区全图》及其以后诸苏州图中的盛家弄。

24 由斯弄，现名泰让桥弄，位于万年桥大街南段，东起万年桥大街，西至泰让桥，……1980年改今名（苏州市公安局编：《江苏省苏州市地名册》，苏州人民印刷厂1988年，第45页）。旧时为商业区，现为居民区。曾用名牛屎弄、牛市弄，为耕牛买卖的市场（叶祥苓《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页；潘君明：《苏州街巷文化》，古吴轩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页）。《同治苏州府志》《民国吴县志》对该街巷标示为“由斯街”，并以该街巷为地标来标识盛家街和长春巷（民国《吴县志》卷二十四下《坊巷下》，第15页，总1338页）。民国诗人范广宪曾在《吴门坊巷待轺吟》卷五中对由斯巷的名称来源进行解读，“由斯街，由衍斯须莫浪夸，青鞋白帽乐无涯。名讹牛矢应堪笑，归路由斯见故家。在盛家街南”。

25 《崇祯吴县志》卷十《风俗》，第2页，总887页。

26 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me)：《人间天堂：苏州的崛起，1127—1550》，引自林达·约翰逊主编、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1页。

27(11) 《皇清诰封通奉大夫显考春江府君行略》，《顾文彬家乘》，苏州市档案馆藏，全宗号030，目录号001，案卷号027。

28 《皇清诰封通奉大夫先祖考镜溪公行略》，《顾文彬家乘》，苏州市档案馆藏，全宗号030，目录号001，案卷号027。

29(12)(13) 《顾文彬年谱》，苏州市档案馆藏，全宗号030，目录号001，案卷号026。

30 汪梧凤：《松溪集》之《乡饮介宾尔全汪公墓志铭》，同治十二年重刊本，第12页。

31 乾隆十三年(1748), 阊门外渡僧桥因遭火灾而倾坏, 致使交通孔道受阻(苏州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301-302 页)。

32(14)《正德姑苏志》卷十九《桥梁上》, 正德元年刊本, 第 23 页, 总 1158 页。

33《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三《津梁一》, 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刻本, 第 41 页, 总 3878 页。

34《民国吴县志》卷二十五《桥梁》, 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第 44 页, 总 1413 页。

35 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之《正月》,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总 81 页。袁氏为嘉庆至咸丰年间人物, “袁学澜字文绮, ……世居尹山乡袁村, ……兵燹后奉母迁居城中”(《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八下《列传七》, 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第 22 页, 总 4897 页)。

36 顾禄:《清嘉录》卷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总 44 页。顾禄(1793—1843 年), 字总之, 一字铁卿, 自署茶蘑山人, 嘉庆、道光年间苏州吴县人。

37《道光苏州府志》卷二百一十七《烈女九》, 道光四年刊本, 第 54 页, 总第 7944 页。

38《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十三《津梁一·府城外元和县治桥》, 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刻本, 第 49 页, 总第 3886 页。

39《苏州城厢明细全图》(1921 年, 比例尺不详), 张英霖编:《苏州古城地图》, 古吴轩出版社 2004 年版。

40《最新苏州地图》(1938 年, 1:10 000), 地图资料编纂会,《近代中国都市地图集成》, 日本柏书房 1985 年版。同样的标识见《最新苏州地图》(1949 年, 1:22 000), 张英霖编《苏州古城地图》, 古吴轩出版社 2004 年版。

41《民国吴县志》卷三十《公署三》, 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第 20 页, 总第 1769 页。

42 苏省舆图局:《苏松常镇太五里方輿图》,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同治刻本;苏省舆图局:《苏松常镇太二里半方輿图》,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同治刻本。

43 石汝杰:《吴语字和词的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版, 第 162 页。

44 嘉庆《吴门补乘》卷七《艺文补》, 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第 79 页, 总 777 页。另,《词苑萃编》载,“朱紫岑宅, 在阊门外桐溪浜。前疏雨楼, 侄秋潭居之。后有萍花水阁, 则为其子桂泉、侄时霖读书地”(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 嘉庆年间刻本)。

45 徐侠:《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下),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 第 666 页。

46 王昶:《湖海诗传》卷十二《沙维杓》, 商务印书馆 1958 年, 第 437 页。

47 江洪、朱子南等:《苏州词典》, 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64 页。

48《皇清诰封通奉大夫显考春江府君行略》,《顾文彬家乘》, 苏州市档案馆藏, 全宗号 030, 目录号 001, 案卷号 027。

-
- 49 《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九《乡都图圩村镇一·北贞五图》，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刻本，第190页，总3007页。
- 50 江洪、朱子南等：《苏州词典》，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 51 《民国吴县志》卷三十九《第宅园林一》，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第46页，总2379页。
- 52 范君博：《吴门园墅文献》卷一《谈丛》，总61页。又，“环秀山庄，在申衙前。清道光末年购于孙氏，建立宗祠。颜曰耕荫义庄，并筑别业曰环秀山庄”。
- 53 《顾文彬年谱》，苏州市档案馆藏，全宗号030，目录号001，案卷号026。
- 54 赖国栋：《历史与心理分析——表现危机的学问》，《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82-191页。
- 55 《皇清诰封通奉大夫显考春江府君行略》，《顾文彬家乘》，苏州市档案馆藏，全宗号030，目录号001，案卷号027。
- 56 “府君幼时受业于蒋实庵先生之门，先生受其慧，期以远。”（《皇清诰封通奉大夫显考春江府君行略》，《顾文彬家乘》，苏州市档案馆藏，全宗号030，目录号001，案卷号027。）
- 57 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57-70页。
- 58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 59 梁仁志：《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明清贾商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安徽史学》2017年第3期，第104-110页。
- 60 《顾文彬年谱》，苏州市档案馆藏，全宗号030，目录号001，案卷号026。另，嘉庆二十四年，顾文彬时年九岁。
- 61 《顾文彬年谱》，苏州市档案馆藏，全宗号030，目录号001，案卷号026。
- 62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八号，同治九年四月十五日，第9页。
- 63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三号，同治九年六月十八日，第20页。
- 64 杜文澜：《憩园诗话》卷三之《顾子山观察词又二则》，福建师范大学馆藏清抄本。
- 65 范金民：《晚清江南士大夫的致仕生涯——以顾文彬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24页。
- 66(11) 《民国吴县志》卷三十九《第宅园林一》之《怡园记》（俞越），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第31页，总2364页。
- 67(12) 刘耀：《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农村经济变化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29-45页；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黄鸿山：《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第74-88页。

页;顾建娣:《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第19-35页。

68(13)《李文忠公奏稿》卷三之《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金陵刻本,第58页。

69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70《同治苏州府志》卷十三《田赋二·户口》,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刻本,第18-19页,总1364-1365页。

71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文汇出版社2019年版,第490-491、541、542、545、441、452、463、472、488、546页。

72 陶大珉:《过云楼顾氏家族书画鉴藏活动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04年硕士论文,第48页。